

皇室文物

The Conversion of Connoisseurship on the
Imperial Antiquities
Academic Symposium

的
鑑賞變遷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8.10.18 - 19

研討會地點：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集賢廳



「皇室文物的鑑賞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 林珮菱整理

2018年10月18、19日，國立故宮博物院於南部院區集賢廳舉辦「皇室文物的鑑賞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此次會議規劃七個不同場次，分別以「皇室收藏在二十世紀的公開展示及其影響」、「物質文化的交流互動」、「皇室品味與收藏」、「鑑藏活動的政治與文化意義」、「收藏品味的變遷與製作」、「中國皇室文物收藏在境外的建立」和「東西方收藏觀的比較」作為主題，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就皇室文物的鑑賞變遷，提出研究成果並共同討論，希望能以更全面的角度帶動皇室文物的研究發展。



圖1 國立故宮博物院 陳其南院長致詞
陳守昱攝 器物處提供



圖2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系 韓書瑞榮譽教授
陳守昱攝 器物處提供



圖3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謝明良特聘教授
陳守昱攝 器物處提供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主體為北平、熱河及瀋陽三處清宮舊藏，二十世紀初因政局動盪播遷至臺灣。在世界博物館發展的趨勢中，這批收藏產生新的文化價值。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初的變動也使大量文物經古董商轉賣至西方，西方收藏界得以逐漸認識中國文物並對其重新評價。本次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由多元的視角切入，討論皇室收藏文化意涵的轉化。

陳其南院長的開幕詞〈故宮歷史和南院的定位〉由在地化的角度出發，以一張荷蘭人手繪臺灣地圖簡述臺灣早期南北發展差異，並且透過南北院建築外觀的比較，說明南院作為亞洲藝術文化中心的意象和特點。（圖1）相較於帝王品味，若由地方工藝的角度切入探討，則可呈現庶民工匠製作的意涵，或與庶民生活相關的一面，如清代深藏宮廷的翠玉白菜，也可藉由在臺中花博展出，與民間關係更親密。

專題演講

皇室文物的文化意涵是一不斷轉化、變動的過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歷史學系韓書瑞（Susan Naquin）榮譽教授講述〈清宮的收藏——移動中的文物〉，提出收藏

就長遠角度而言一直在移動，包括文物在內的所有人造物都在不斷地流動。（圖2）韓教授以個人鑑賞中國文物的經驗出發，思考複製品對專家知識的影響，提出重要的問題，如複製品是否擴大觀眾群並且弱化了專家與鑑賞家？博物館面臨競爭是否過度商業化，花過多心力開發商品？隨著數位媒體的發達，如清宮劇的流行，專家和研究者的未來在哪？韓教授認為首要任務是我們必須認真看待所有的複製品，各種媒體所生產的複製品都是歷史的一部分，這需要不同的專家和機構共同努力。

不同於專家或鑑賞家的角度，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謝明良特聘教授由工匠的視角出發，提出「原型」和「祖型」的概念，以〈高麗青瓷的紋樣和造型的省思〉為題，重新思考陶瓷史研究。（圖3）謝教授以龍紋為例說明「原型」和「祖型」的定義，如金銀器影響宋代陶瓷的龍紋為「祖型」，元青花瓷龍紋則是明代的「原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祖型」可跨材質，它也許是一種社會氛圍，也可能是想像而成的，或者來自工匠各自不同的理解，如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高麗青瓷獅形香爐〉，可能是一種想像的時代樣式而非區域風格。

皇室收藏在二十世紀的公開展示及其影響

1925年清室善後委員會仿歐洲國家的博物館，建立故宮博物院，將皇室收藏文物公開展覽，這個發展對於西方來說始料未及。法國賽奴奇亞洲藝術博物館（Musée Cernuschi）易凱（Eric Lefebvre）館長〈從法國角度來看故宮博物院的創建〉提出法國的觀察，藉著法國小說家謝閣蘭（Victor Segalen, 1878-1919）描寫的中國皇宮，法國人一開始將故宮想像成歷史紀念碑，並未想到故宮會成為博物館，這種觀點



圖4 法國賽奴奇亞洲藝術博物館 易凱館長
陳守昱攝 器物處提供



圖5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藝術學院 來國龍副教授
陳守昱攝 器物處提供

一直到1935年倫敦的中國藝術展才有了轉變。（圖4）當時活躍於法國的中國藝術家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不只集體前往倫敦增進中國文物知識，也藉由藝評、策展向法國介紹中國古代及現當代藝術。在中國方面，二十世紀初西方列強及日本對中國文物的劫掠，激發人們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藝術學院（College of the Arts, University of Florida）來國龍（Goulong Lai）副教授發表〈清宮皇室收藏文物性質的變遷及其國際背景〉，將清宮皇室收藏的變遷，放到中國近現代文化遺產保護的法律框架下來進行討論（圖5），例如1909年《保存古蹟推廣辦法章程》，人們已意識到古蹟、文物的歷史及藝術價值。當時的清朝遺老、北洋政府官僚和北京大學國學門學者們都分別對清宮皇室收藏表達關切。

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陸於平（Yu-ping Luk）研究員〈「中華文明」的再現——大英博物館清宮舊藏繪畫的收藏和陳列〉藉由館藏中國文物展示方式的變遷，談論大英博物館對清宮舊藏的理解，並且提出反思。如館方最初將〈女史箴圖〉的畫與跋分開裝裱，外觀看來像西畫，此時不提皇室收藏，也不太看收藏印鑑和題跋的部分。直到二十世紀初六〇年代館方買進一些清宮舊藏，才重新反思館藏中國文物，為了填補落差也參考乾隆皇帝（1711-1799）的收藏，開始注意作品品質。

物質文化的交流互動

十八世紀的歐洲十分嚮往中國，紛紛派遣使者訪華爭取貿易交流的機會。其中，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st Earl Macartney, 1737-1806）使節團便是極為重要的例子。這一場中西交流留下

了諸多文獻，如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於1996年出版的《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英國出版馬戛爾尼及使團成員的日記和旅遊紀行，大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所保留的東印度公司（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資料。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劉明倩（Ming Wilson）研究員發表〈乾隆皇帝如何看待英吉利國使團貢物〉，藉由這些史料談論英國大使帶到中國的禮物，以及乾隆皇帝和身邊官員如和珅的反應。（圖6）

清宮和西藏之間的交流，在宗教方面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陳慧霞副研究員藉由兩岸故宮所藏的七組木碗，探討西藏與清宮的交流，發表〈來自西藏的木碗：清代宮廷與西藏的互動〉。清宮木碗及碗套可見西藏工藝製作的特點，以及其與宮廷工藝的互動。特別是清宮對「鍍金」的講究，顯示宮中可能有來自西藏的工匠。同時也談論木碗作為貢品的意義、進貢者與呈進事件的背景，分析清宮受禮的反應與回禮，並整理其對木碗處理的方式，由物質文化與經濟的角度，進一步理解清宮與西藏的關係。

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The Rijksmuseum）Duncan Bull 研究員以義大利繪畫為例，提供了歐洲的參照，探討荷蘭皇家私人收藏，發表〈荷蘭的義大利繪畫收藏與鑑賞〉，論述十七世紀以來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Renaissance）繪畫在歐洲的流動與收藏。（圖7）這些繪畫長時間大量流經荷蘭，但都旋即交易至其他國家的宮廷、私人藏家之手，直至二戰前後，才逐漸聚集到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皇室品味與收藏

清代皇室收藏的規模與質量為歷代之冠，



圖6 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 劉明倩研究員
陳守昱攝 器物處提供



圖7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Duncan Bull研究員
陳守昱攝 器物處提供

乾隆皇帝曾對清宮文物進行品鑑與整理，甚至為其量身訂做收存的匣盒，也從中衍生出別具時代特色的新品。日前於南院展出的「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特展從乾隆品牌醞釀成形的視角出發，重新思索十八世紀出產的新樣式和皇家舊藏文物之關聯。（圖8）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侯怡利副研究員藉由乾隆八年（1743）重新改裝九份「百什件」一事，探討乾隆皇帝對於「百什件」的重裝，以及乾隆朝「百什件」樣式的確立。從套箱、



圖8 與會學者參觀南院「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特展
陳守昱攝 器物處提供

屨板、內部古玩的選擇以及為古玩搭配各種座架，可見乾隆皇帝的用心及講究。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余佩瑾處長核對傅世雞缸杯與《活計檔》的關連，確認院藏一組成化官窯為檔案所記之「采挹流霞」箱，以此箱所收雞缸杯為例，探討此類文物從製作至乾隆朝鑑賞變遷的面向。（圖9）同時反思乾隆皇帝組合微型收藏的目的，此種收藏現象並非清宮獨有，歐洲也存在娃娃屋、珍奇櫃等案例。這可能是一種世界風潮，但對乾隆皇帝而言，鑑賞文物絕非玩物喪志，有以史為鑑之意。

鑑藏活動的政治與文化意義

皇室收藏往往有著政治和文化的象徵意義。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盧慧紋副教授發表〈兩宋內府的法書鑒藏變遷及閣帖重刊活動〉，以北宋太宗（939-997）《淳化閣帖》為例，探討兩宋內府對於法書的翻刻與整理，進一步思考複製技術在作品流傳與典範塑造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靖康之難，宋室收藏流散，南宋高宗（1107-1187）為了重建內府收藏，多次下令搜訪文物。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許雅惠副教授發表〈南宋前期的金石收藏——皇帝、權相與士大夫的角色〉，藉由阮元（1764-1849）收藏周良

謹摹的王厚之（1131-1204）《鐘鼎款識》，探討高宗朝利用榷場貿易收回失物、秦檜父子索求古器物的情況。同時士大夫也做出努力，如洪适（1117-1184）《隸續》收入漢魏晉碑銘、摩崖石經和碑的樣貌，試圖保存、記錄文物資訊。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邱士華助理研究員發表〈由董誥畫作看清高宗、清仁宗繪畫鑑賞品味的改變〉，探討詞臣畫家董誥（1740-1818）的作品，於乾隆和嘉慶兩朝由巨嶂式山水偏向節慶風俗。（圖10）以往祥瑞與民俗節慶相關主題為宮廷畫家負責，嘉慶朝（1796-1820）則將節慶風俗題材的繪畫推至極致，詞臣畫家也畫相關作品，如董誥《履端紀麗冊》、黃鉞（1750-1841）《齋豐協象冊》等，這些冊頁如同單景精粹式的〈清明上河圖〉，有許多敘事性細節。

收藏品味的變遷與製作

皇帝個人的品味或意志是否左右宮廷製作？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吳曉筠副研究員發表〈傳移模鑄——乾隆時期的宮廷造鏡〉，乾隆皇帝雖然有豐富的古鏡收藏，但其製作的仿古鏡是以古代圖譜《宣和博古圖》為藍本，進行古代紋飾的再造。過去對仿古的理解多為風格或內容的追求，但在某種程度上乾隆仿古鏡及其包裝表現的則是一種風格的創造。

至於圖書文獻處許媛婷副研究員則是透過乾隆皇帝仿效五代南齊（479-502）蕭鈞（473-494）手寫五經的巾箱本概念，探討有關宮廷袖珍本的製作及賞賜與否的現象，進而關注皇帝下令製作宮廷圖書與賞賜之間的關連性。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命武英殿及造辦處先後製作古香齋袖珍本以及《御製詩集》、《御製文集》袖珍本，然就目前所見奏摺，並未有以袖珍本賞

賜臣下之實證；而後，嘉慶朝宮中雖有袖珍本《御製詩集》、《御製文集》，然並非皇帝下令武英殿製作，而是臣下奏請自行刊刻，再由皇帝賞賜給眾臣。可知乾、嘉兩朝雖皆有宮廷袖珍本，然其本意之殊而有賞賜之異，形成有趣的現象。

中國皇室文物收藏在境外的建立

荷蘭萊頓民族學博物館（The Ethnological Museum）和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收藏許多來自海牙律師兼業餘漢學家羅耶（Jean Theodore Royer, 1737-1807）舊藏的中國文物。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Jan van Campen 研究員發表〈十八世紀荷蘭海牙的一批中國收藏〉，探討這批中國文物的特質以及羅耶的收藏策略。Campen 指出羅耶的藏品包括外銷西方，或為討好中國客戶的歐式中國風格作品，他所看見的也許可稱為「廣州式」的中國文化。

日本江戶幕府收藏也是流動的，作品藉由大名貢獻或將軍下賜流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塚本鷹充副教授講述〈清宮收藏與江戶幕府的中國繪畫收藏〉，以《德川實紀》和傳世「柳營御物」探討日本江戶幕府收藏中國繪

畫的具體情況及其收藏模式，最後談論江戶幕府和清宮於收藏概念上的連結。（圖 11）他指出十八世紀末以後的狩野派開始為鑑賞目的製作名品摹本，這些更鮮豔、漂亮的摹本需具有一定的古畫知識才能鑑賞。因此，通過對古畫及摹本的鑑賞，建構了特殊的社會統治方式。

法國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藏有許多精美的中國掐絲琺瑯器，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 Béatrice Quette 研究員〈西方收藏家與中國掐絲琺瑯器——1860 至 1920 年代大衛·大衛-維爾（David David-Weill, 1871-1952）的獨特品味〉以館藏為例，談論幾位捐贈者，特別是大衛-維爾的收藏品味。十九世紀後半至二十世紀前半大部分西方收藏家所偏好的中國掐絲琺瑯器是大型作品，特別是具中國青銅禮器形制、附有年號款的器物。相較之下，大衛-維爾偏好小型作品，顯然他對不同的紋飾和器形感興趣，這些作品提供當代藝術家和工匠觀摩、討論裝飾藝術的機會。

東西方收藏觀的比較

英國巴斯東亞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East Asian Art or MEAA）蔣得莊（Nicole Chiang）



圖9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余佩瑾處長
陳守昱攝 器物處提供



圖10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 邱士華助理研
究員 陳守昱攝 器物處提供



圖11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塚本鷹
充副教授 陳守昱攝 器物處提供

館長對清宮與歐洲皇室收藏概念進行對比。其〈收與藏——東西方宮廷中收藏、視覺與展示之間的關係〉提出不論是東西方宮廷收藏，均不僅只是為展示皇權及身分地位。她進一步以「隱藏」的觀點重新檢視乾隆時期的清宮收藏，在比較的觀點下審視東西方宮廷收藏、視覺與展示之間的關係。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有段鑑賞中國陶瓷的特殊歷程，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研究部 Marta Ajmar 副處長發表〈「置於光下」——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中國陶瓷、材質模現與實用知識〉，以義大利梅第奇瓷器（Medici porcelain）和絞胎陶瓷探討文藝復興時期的中

國陶瓷收藏。Ajmar 嘗試以材質模現（Material mimesis）的框架，談論跨文化知識生產的實踐面，透過工匠遺留下來的草稿和作品材質互相仿效的過程，可理解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嘗試以實際技術、結構層面鑑賞中國陶瓷。

小結

世界上許多博物館的典藏是來自於皇室收藏。隨著收藏脈絡由屬於少數人的宮廷收藏轉為今日面向社會大眾公開展示，古代文物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中產生了多元化的文化價值，也因此過去宮廷收藏的印記至今仍是深具吸引力的主題。本次會議即是在這大框架中，通過前述七個子題，從東西方皇室鑑賞與品味的建立與比較、文物的流動及現代意義的衍生，回顧並更進一步地深入探索宮廷收藏的轉化及其時代意義。（圖 12、13）如同韓書瑞教授所說「這些主題互相牽連，中國是牽連到全球的。好比說乾隆皇帝不只是一個人來做收藏，他是廣大網絡之一，連繫其它的皇家鑑賞與收藏。」

整理者為本院器物處研究助理



圖12 「皇室文物的鑑賞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現場聽眾
陳守昱攝 器物處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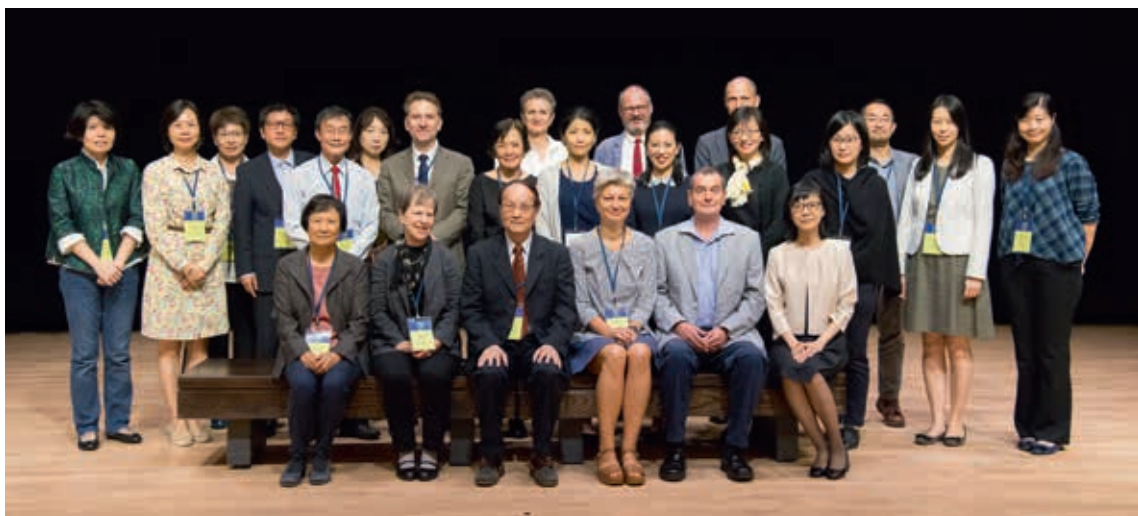


圖13 與會學者合影 陳守昱攝 器物處提供
前排由左至右為賴惠敏、Susan Naquin、陳其南、Marta Ajmar、James N. Spencer、余佩瑾；後排為侯怡利、許雅惠、陳慧霞、來國龍、陳國棟、櫻庭美咲、Eric Lefebvre、劉明倩、Béatrice Quette、陸於平、Duncan Bull、蔣得莊、Jan van Campen、盧慧紋、邱士華、塚本鷹充、吳曉筠、許媛婷。